

The Origination of the Twin Concepts 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 and the Interplay among Their Three Structural Levels

FENG Quango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p.5

Abstract: Despite their façade of familiarity, the concept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S remain confused and confusing deep down. This paper holds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poetics, images, thinking and so on are what calls into being this binary opposition. With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pair of concepts would be meaningles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furthermore, take place on three levels, namely, the sentential/methodical level, the textual/strategic level, and the ethical level which involves the translator's attitude toward the foreign culture concerned. The paper further maintains that in an ideal situ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thical dimension is contingent on that of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is then dependent on that of the methodical dimension, whereas the ethical level controls the strategic level, and the strategic level in turn controls the methodical level.

Keywords: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method; strategy; ethic

The Eco-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HU Gengshe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24

Abstract: Taking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Kuhn's concept of paradigm,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ose problems that had plunged TS into a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ncluding its lack of an ecological dimensi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ltural turn" it had undergone, the disadvantages of its tendency toward polarization,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theories. Such a crisis in practice inevitably brought about a paradigm shif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of which the emerging of the "eco-paradigm" was a result. Riding on the wave of the global trend in ecological studies and drawing also from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ies, the integrative thinking and the deepening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eco-paradigm"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has given rise to Eco-Translatology as a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system in TS.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paradigm crisis; paradigm revolution; eco-paradigm

The Constraints of Poetics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Original in Su Manshu's Literary Translation

HUANG Yuanju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p.50

Abstract: Su Manshu, an early 20th-century man of letters, translator and monk, occupies a special position in China's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his pioneering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Indian literary works, and even Victor Hugo's *Les Misérables*. As a translator, he was wont to change the ST's linguistic style, literary form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adopt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method of "heroic translation." While such an approach has caused some scholars to set his translation up as a negative examp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rom a cultural theory-informed perspective, the dominant poetics would necessarily restrain and manipulate translation, and Su's reshaping of the original must therefore be seen as essentially his dynamic adaption to the target language's received mode of poetics, justified as an ac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By subjecting Su's renditions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and *Les Misérables* to a close re-examination, the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since the poetics governing the production of ST necessarily differs from that governing the production of TT, rewrit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unavoidable, and a focus on poet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hence called for.

Keywords: Su Manshu; reshap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poetics; constraint

建构主义翻译观：理据与内涵

——从翻译本质说起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

摘要：建构主义翻译观是哲学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按照这种观念，翻译不只是一种符号性认同行为，也是一种主体建构行为，以及面向“他者”的社会性认同行为，具体表现在：首先，作为翻译的对象，文本的意义不具有先在性和确定性，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表象主义”不可取；其次，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不是通过遵守语言规则“发现”文本意义，而是通过意志与能动性“建构”文本意义；再次，翻译是“事件化”的话语行为，具有多重生产因素，并表现出历史化、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概言之，建构主义翻译观即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本质主义翻译观的拓展与修订。

关键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事件化；历时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8) 05-0005-08

哲学意义上的建构主义是一种迥异于本质主义的主体对于世界、社会和自我的理解和把握。本质主义认为，世界万物虽然表象繁复，但背后各有其本质与确定性。本质主义对于本质与确定性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追寻，又有认识论意义上的逻辑分析，虽然它因为方法、类型和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形态，但从倾向上讲却越来越典型化与绝对化，既排斥主体对于知识生成的能动性，又否认社会历史语境对于认识的建构性。与此相反，建构主义则不仅否认事物的本质和绝对确定性，而且拒绝将主体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看作是无意识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主体与环境对于知识生成和社会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建构主义者，尤其是黑格尔与皮亚杰等群体建构主义者，修正了康德等个体建构主义的非历史性，认为知识与对象的符合不是在静态的认识结构，而是在认识与对象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中实现的。建构主义映射至翻译行为及其研究中，便形成了建构主义翻译观。建构主义翻译观的理论要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 知识是生成的，而非客体自身携带的；(2) 意义不一定出自符号内部，不具有“先在性”和“自足性”，而是一种典型的“操作性行为”，与译者自身“意志”密切相关；(3) 翻译是一种“结构”，而结构和结构之间具有关联性，因而翻译的建构不是封闭的，而

是一个历时的、不断完善的过程；(4) 翻译是一种“事件化”的话语行为，它的兴起、操作、传播和接受并非完全来自语言性或文本的意向和修辞等美学因素，而是来自它和社会效应的事件之间的联系。翻译的“事件化”越强，翻译行为及其产品便越能获得关注与影响。

一、何谓翻译的本质

“本质”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在”，直接决定事物的定义。苏格拉底说，对一个事物而言，首要的是要认识它“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就是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即，“本质规定”（奥努弗，2006：60）。比如，回答“什么是美”、“什么是勇敢”，不能只回答“美”和“勇敢”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必须回答它的最具根本性的属性。同理，回答“什么是翻译”，也不能只回答它的具体表现形式。翻译可以有多样化的特点或属性，但这些特点或属性不一定是翻译最具根本性的特征。翻译最具根本性的特征是语言性，它是“翻译之所以为翻译”并区别于其它语言事件或语言实践的根本所在。语言性是对翻译的本质性规定，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翻译定义。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人在一般的社会实践中可以有适当的个性，但译者是特殊的社会实体和伦理实体，他应该力求接受语言性的规范。黑格尔曾

经说,“为了消除其特异性,必须对个体灵魂加以改造”,这一点完全适用于翻译行为中对译者的道德管束(谈际尊,2012:49)。就翻译而言,无论我们的认识和判断有多大差异,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我们可以对文本转换的结果与形态进行价值判断,看看它是不是源语文本的“共相”。反之,如果它只是留存了源语文本的部分特征,那么它就不是“翻译”。翻译从定义上讲就应该是严格的,它应该将各种分化或裂变形态排除在外。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术界对翻译进行了许多新的思考,形成了许多历史化、语境化的知识模式,但这些模式与其说是否定了翻译的本质,毋宁说是否定了翻译的本质主义。

二、本质主义翻译观及其症结

众所周知,本质主义的产生源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化,它以牛顿力学为代表,以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持续性发展与繁荣为推力,试图将主体的认识论和世界观自然科学化。本质主义认为,万物皆有本质,且本质具有恒定性、普遍性和静止性,是不变的“实体”,它与社会历史语境和“人”的意志无关,不是社会文化和主体性的建构物。如温伯格指出的那样,还原论虽然冷漠无情,但我们必须接受它,因为世界本就那样,它是“本质既定的”(温伯格,2003:44)。此处,温伯格的观点即是本质主义的体现,这种观点一方面预设了“基础主义”认识论,认为世上存在不证自明的东西,另一方面又预设了真理“一元论”,认为不变的“秩序”即世界/事物的本质和结构。康德曾指出,世界由“现象”和“本质”构成,“现象”即“对象”,是“本质”作用于主体感官的产物,而本质具有实体性和恒定性,它不依赖主体和主体认知(同上:45)。而在主体问题上,本质主义则预设了“人”的理性本质,并将它工具化,认为主体通过理性可以认识本质。例如,克里普克在《命名和必然性》中便提出“从物模态”问题,认为“本质”可以被发现和认识(冯棉,1996:13)。

本质主义作用于翻译研究,便形成了翻译的本质主义观。这种观念在命题上不同于翻译

的本质之说,它是以哲学上的本质主义为依据和认识论,对翻译研究中除翻译定义之外的其它翻译范畴进行的描写、阐释与研究。换言之,是翻译研究中的一种本质主义路径。本质主义翻译观认为,行动论意义上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翻译和世界万物一样,也有既定的、超越历史的永恒本质。这种本质源于,并决定于翻译对象,即文本及其表意机制的先在与确定性。文本及其意义具有自在自为性,它不依赖于文本以外的其它因素,也不需要主体作为诠释者的能动参与。翻译研究只要先验地提出问题,并掌握所谓“正确”、“科学”的方法,就能把握翻译的普遍规律。

“意义”的自在与自为是本质主义翻译观中最基础性的命题,它决定了翻译的其它范畴,如主体性的缺失、译者阐释空间的压缩,以及翻译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脱离,等等。在本质主义翻译观中,客体认识不会对主体性提出任何要求,主体的认识或知识不会参与客体的建构,翻译的任务只是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metaphysical realism)。面对这种观念,我们不禁要问,文本作为翻译对象其意义是否具有先在和确定性?意义是否可以脱离主体性而实现自动传达?维特根斯坦曾说,“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差异在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尤其是语言的内部机制,而语言哲学虽然也把语言研究作为途径,但它的终极目的却是回归本体论与认识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说法,也可以针对翻译提出一系列相似问题。例如,作为翻译的对象,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究竟是“语言性”的结构,还是“生活性”和“经验性”的结构?换言之,文本体现的是语言的世界还是生活的世界?在这些问题上,维特根斯坦的态度明显倾向于后者。在他看来,语言从来都是与“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不是“一条边相切方式的”接触,而是“难分彼此的大面积交织”,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语言游戏”(陈嘉映,2003:185)。

既然文本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纯粹的语言形式,那么文本意义的生成和阐释便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尤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制

度,乃至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换言之,既然“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那么后者便一定会参与语言游戏的意义建构。因而,纯粹从语言规则的有效性出发,对文本意义进行逻辑实证主义考察,不具有彻底的合理性。相应地,翻译研究中也不能认为文本一旦形成,其意义便自行存在且被固化,译者的任务只是被动地融入文本的语言结构和符号世界,任由“语言的阉割”。译者被语言“阉割”,或被语言撕裂,从而沦为“不思的主体”或“无意识主体”,这一点无疑是本质主义翻译观在主体观上的逻辑引申,但它并非译者的实际生存状态。恰恰相反,在任何具体的翻译行为中,由于译者不仅要面对翻译对象的客观性,而且要面对自身的主体性,以及文本之外的翻译环境等客观因素,因而他一定会在主体性和客观性之间不断进行着“同化”与“被同化”的角色转换,并表现出高度的建构性特征。

三、翻译的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翻译观即哲学上的建构主义,尤其是建构主义知识观,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因而,建构主义翻译观是建构主义在翻译学科中的具体形态,这种形态比本质主义翻译观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更能描述和揭示翻译的现实情态以及译者的生存状态。首先,建构主义强调结构和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认为结构的建构过程具有开放性,它是一个被不断完善的过程。其次,建构主义认为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且主体在知识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再次,翻译作为一种建构行为,其对象的意义不是译者通过遵守语言规则“发现”的,而是作为主体通过自身意志加以“建构”的。以上三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话语模式。众所周知,“文化转向”以来,关于翻译研究的学术资源非常庞杂,思想丰富多样,这些思想虽然视角和观点不尽相同,却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在它们看来,翻译是文化和语言建构的方式,因而不能脱离制约语境空谈翻译。就像建构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人所认识的,只能是认识本身之中的对

象”(员俊雅,2011:5)。从这一观点出发,显然有理由怀疑本质主义者将翻译看作非历史的,并将意义看作先验的和永恒不变的实体的相关论调。

(一)“翻译”概念的建构

“翻译”概念是翻译理论思考中最基础、最根本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生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产物。在中国传统译论史上,最早用来描述和概括语言交流的不是“翻”,也不是“翻译”,而是“译”。如《礼记·王记》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又说:“象胥氏通六蛮语,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贺爱军、乔璐璐,2013:41)。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各个地域的翻译活动态势和规模上均出现变化。如赞宁在《译经篇》中写道:“今四方之民,译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同上:42)。即是说,由于北方同外族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译”逐渐取代“寄”、“象”和“狄”成为译者的统称。此外,《法句经序》和《鞞婆沙序》中,支谦与道安也提到了“译”,并仍用它指佛经译场中“译人”的工作,后者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口传”,一个是“传音”(王向远,2016:140)。

至于“译”不作“译者”而作为“翻译活动”理解,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与封建政府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例如,从周朝“大行人下属的象胥”开始,直至清朝时期的“会同四译馆”和总理衙门,政府的外交活动几乎未曾间断。由于这些政府机构中均设有译员,其主要活动即语言沟通,这一点使得“译”在指称上从最初的译者逐渐向翻译活动进行转移,同时在词性上也发生了改变。《礼记·正义》中说:“译,陈也,谓陈说内外之言。”《周礼义疏》中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说文解字·言部》中则说:“译,传四夷之语者”(贺爱军、乔璐璐,2013:43)。以上几处“译”正是指语言之间的转换。

到了南朝齐梁时代,僧祐在《出三藏记集

序》中提出了另一概念“翻转”。僧祐指出：“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释僧祐，1995：2）对僧祐而言，“翻转”重在“翻”而非“转”，它既可作地理层面的理解，又可作译文转换层面的解释。但不管作哪一种解释，都已不同于此前的“译”。因为，“译”是平面移动的概念，而“翻转”中的“翻”是立体化的感悟和理解，如《出三藏记集》中的“僧伽罗叉手执胡本，提婆翻为晋言”，即此之谓。

隋唐以后，“翻”字的出现频率明显提高。如玄奘所说：“所翻经纶，在此无者宜先翻，旧有者在后翻。”又说：“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孔慧怡，2005：21-23）此时，“翻译”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也开始出现，如《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中说：“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释僧祐，1995：371）。南梁时期，“翻译”二字也曾联袂使用，但次数不多，如《高僧传》的“译经篇”中，“翻译”一词只出现过八次，其中包括“悟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等（曹明伦，2007：201）。但即使如此，唐朝以后，“翻译”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它作为翻译的本体话语开始得到固定，这一点却毋庸置疑。例如，在《续高僧传》的译经篇中，“翻译”共计出现三十次。《开元释教录》中，也有了关于“翻译”二字的长句。《宋高僧传》中，“翻译”也出现了二十四次。在这一时期，众多佛经译者如法云、慧皎、昙宁和释慧恺等开始频繁使用“翻译”概念。如《翻译名义集》中说：“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高僧传》中说：“属有支谶、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竺淑兰、无罗刹等，并妙善梵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和“闻跋摩游心此论，请为翻译”等（释慧皎，2010：189-190）。《深密解脱经序》中则说：“但东西音殊，理凭翻译，非翻非译，文义斯壅。”（许明，2002：150）凡此诸种，不一而足。总之，随着从“译”到“翻译”的动态发展，翻译的内涵逐渐扩大，外延也得到发展。直至清代，“翻译”作为学科概念的地位终于得以确立。

· 8 ·

（二）意义的建构

皮亚杰曾经阐述认识与知识的生成性，指出认识结构具有历时性，它既非源自那个不受主体影响的客体，也非源自那个无视客体的主体，而是源自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皮亚杰，1981：171-173）。主体与客体之间只有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活动”，而知识正是在“活动”中被建构起来的，它是一个不断生成，而且可以不断被超越的过程。皮亚杰明确指出，哲学体系不是“线性结构”，而是一种“圆圈结构”，它不需要从某一个确定无疑的“点”出发，而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出发，所处的也是一种循环反复的历史运动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运动过程中，知识和认识才能不断被实现、被建构，而所谓“自在之物”在认识的历时性面前既不存在，也没有意义（王至元、陈晓希，1983：16）。皮亚杰的观点和同时代的维果斯基非常相似，后者也认为“知识”不过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加以建构的。维果斯基将其称之为“主体的能动的知识建构”。按照这种观点，知识的建构密切关系到主体的意识过程及其变化，而社会符号系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Eggen & Kauchak, 1997：37-39）。维果斯基认为，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分离的。相反，社会不仅赋予了个体秩序和主观意义，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的形成。

就翻译研究而言，皮亚杰与维果斯基观点的揭示性主要体现在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上。翻译的对象是文本，准确地说，是文本的意义结构。因而，对翻译研究来说，如何认识和评价文本的表意机制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奥格登与瑞查兹曾深入研究符号、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虽然具有规约性，但意义却并非完全产生于符号本身，而是语言和主体的心灵相互感应生发的一种认知情感体验（黎昌抱，2006：39-40）。比如铁钉和皮肉相互接触可以产生痛感，然而这种痛感作为意义，并非先在地附着在铁钉之上。正如语言和经验分不开一样，意义也无法离开主体的社会生活与实践，尤其是主体将语

词的“符号化”。对意义而言，其最初的本原既不是纯粹的源语文本，也不是纯粹的主体意向，而是文本与主体之间以情境为中介产生的交互作用。关于这一点，维果斯基的儿童行为研究可以用作说明。维果斯基通过长期观察儿童的某些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最终如何演变成手势语言，发现了主体经验与符号语言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发现了“意义”的建构性，它相当于蒯因所说的“操作性行为”（Vygotsky, 1978: 56）。然而，由于主体见到符号便可以唤起经验，而遇到经验后又可以联想起符号，这种对于意义近乎自动的反应往往让人误以为意义出自符号内部，而忽视了意义的建构性。

翻译的对象是文本，但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文本作为“第一世界”只是为译者提供了重要的语义框架和行为依据。文本只是一种“提喻”，它是思想与概念的“起搏器”，是意义的“潜势”，但它既不是意义的完型，也不是意义的定势。作为文本的内辖单位，语篇自身并没有业已存在的、亘古不变的意义实体。如伊格尔顿指出，意义没有“守恒性”，这一点显著地体现在符号的“可重复性”之中。符号需要不断重复与再生，符号的再生性是符号的重要特征，它表明符号在不同的语境里意义不同，因而符号“永远不必”，也“永远不会”和自身一致（Eagleton, 1983: 129）。

（三）主体性的建构

如上所述，建构主义的基本任务和本质主义一样，也是解释“知识是什么”的问题。然而，建构主义不像后者那样将主体挡在知识之外。相反，它认为“知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笛卡尔说，人的感觉与经验不能提供“普遍性的必然知识”，真正可靠的知识只能通过人的理性和推理获取（笛卡尔，2000: 45）。康德也曾说，“物自体”的概念表明先验主体的认知形式具有缺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先验主体对于事物和知识的建构没有作用。与其说“知识依照对象”，毋宁说“对象依照知识”（康德，2004: 621-622）。虽然康德在知识的生成问题上有过表象主义之嫌

的某些阐述，但他的知识观整体上属于建构主义，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洛克莫尔，2014: 52）。因为，在传统的表象理论中，关于主体的描述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客体被视作知识的来源，主体性则是通往客体性的路径，而康德在对笛卡尔和休谟的批判和继承中，认识并强化了主体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当然，康德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受到了笛卡尔的基础主义的影响，它过分强调认识的可能性对于主体理性中的“先验感性形式”和“先验自我范畴”的依赖，因而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所幸，这种观点很快被皮亚杰等加以修正。

皮亚杰在阐述自己的发生认识论时指出，认知图式就是一种特殊的结构，这种结构与传统的结构主义者（如格式塔主义）至少存在以下不同：其一，在皮亚杰的“结构”论中，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割裂的，虽然整体作用于部分，但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二，一般结构主义者强调结构的“内在原理”，而皮亚杰强调结构的缺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构的开放性；其三，一般的结构理论渲染社会结构的决定性，贬低或否认个体作为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而皮亚杰认为，不仅主体是能动的、积极的，而且结构本身也具有主体性和个体性。因而，要研究主体的认识结构，不能忽视结构的历时性，必须从“认识的成长”而非“认识的当前状态”出发。所谓“历时性”即“建构性”，这一点正是皮亚杰将自己的认识论称作“建构学说”的原因所在（王至元、陈晓希，1983: 15-16）。

事实上，当尼采说上帝已死的时候，那种凌驾于现实存在之上的古典理性便已经死去。在尼采看来，上帝是抽象的、僵化的具有本质主义之嫌的“意义”概念，但现实中的人具有生命意志和内在创造性。必须明白，近代科学和哲学所指称的世界和经验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基础。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世界即是“人在其中的世界”（易小明，2005: 283）。世界的结构和存在状态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主体依靠语言加以描述和实现的。德里达

的“延异”概念表明，本质既不是即刻给定的，又不是预先给定的。所谓“区别”和“差异”，其目的就是为了无限期地推迟“本质”的出现，而所谓“宏大叙事”从根本上讲也离不开阐释的主体性。

巴尔胡达罗夫(1985: 19, 80)说，翻译不是同语言打交道，而是同言语打交道。既然翻译是言语/言语产物，便不能回避社会文化现实因素。语言环境作为背景信息参与意义的构建，这是诗学批评的一贯立场，也是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语境的意义不见得在译文中处处表现，但翻译需要处处同符号文本的语境打交道，这一点既是语境观，又是主体观。因为，作为影响意义建构的重要因素，语境的构成纷繁复杂，其识别与甄选不能在主体性之外加以完成。比如，蒯茵(2005: 257-269)从行为主义出发，指出意义有两个确定来源，即“概念”和“经验”，二者便都与主体性有关。尤其是“经验”，它是主体对于人类语言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的观察，更需要能动性和意识的参与。蒯茵认为，“学习”对于习得语词意义非常重要，但在“翻译”的背景下确定语词意义极其复杂。在他看来，意义一方面来自“概念”，另一方面来自主体的“观察”。前者即固化在语言中的、先验的意义，和主体大脑中的图式结构有关，后者则是话语的情境或语境，需要主体敏锐地加以捕捉和把握。虽然语言是一套合式的组合规则，但语言之所以是语言，一方面必须能成为其它事物的表征，另一方面则必须依赖主体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后者正是语言的主体性。正如斯帕波和威尔逊(2008: 172)所说，若想要外部语言发挥功能，交际者必须拥有丰富、强大的内部语言，这一点不仅说明了文本表意机制的复杂性，而且说明了翻译机制的主体性和认知特性。翻译是对源文进行语际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它需要译者作为交际者的认知参与。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源语文本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向度的语义阐释。这种阐释的完成需要译者利用已有信息来解释源文信息，并在“含义”的背景下重新选择意义及其符号代码。凡此种种，皆可见翻译的主体性。

· 10 ·

(四) 翻译的事件化

本质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的对象是文本，而文本具有“先在规定的”、“既成的”本质，它是“自在实体”，与主体无关。按照这一逻辑，翻译行为及其研究便无需“事件化”，因而也无需关注主体的当下生活和现实处境，这一观点与建构主义的学理格格不入。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翻译从来都是复杂的、多元的，它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形态。而无论是何种形态，有一点却是不变的，那就是，翻译行为始终是一种“事件化”的话语行为。所谓翻译行为的“事件化”主要是指翻译行为的兴起、操作、传播和接受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来自源语文本的语言性，甚至不是来自源语文本的意向和修辞等美学因素，而是与译者的身份或身份转变、接受条件和接受环境的形态与要求，以及赞助人的赞助意愿等具有社会效应的事件相联系，并通过与翻译相关的某些“事件”扩大翻译行为及其产品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这一道理和文学的“事件化”颇为相似。如陶东风指出的那样，文学只有被媒介关注，成为公共事件甚至新闻事件之后，才会受到关注，进而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陶东风，2012: 334)。翻译事件也是如此。纵观晚清以来直至“文革”期间的翻译活动，有一种态度和倾向是极为明显的。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翻译似乎都罹患了某种心理强迫症。在这种强迫症的驱使下，译者们担心被冷落，害怕被遗忘，因而寄希望于通过“事件化”的翻译追求外部效应，引起社会关注。比如严复和林纾，又比如梁启超和鲁迅，都是如此。因而，他们的翻译有着严重的纪实化倾向。这些纪实有的是因应源语文本的体类特征，有的则是改串原有文本的叙事内容。不论是何种情况，译者多数情况是想借助于表现事件关注现实。对于译者而言，翻译行为越能表现重大事件，文本的写实力度越能得到保证，翻译就越能表现出震撼效果，从而越能引起关注，并实现翻译的意图。

翻译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语境化的行为。这种语境性除去一般意义上的语境特征和语境功能外，也往往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

事件而凸显。很明显的是,步入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所谓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事件”接踵而至,如社会制度的兴衰、社会生产模式的更迭、科学和技术上日渐强烈的进步需求、大规模的社会思潮与运动的呼声,乃至学术思想的转变等。这些事件无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并作用于翻译的兴起、传播、接受和批评的全过程,并构成了翻译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场域。这些事件不仅从翻译的外部进入其内,而且在事件化的翻译场域中与翻译交织成翻译的书写和批评的内在机制。作为翻译的外部条件,“事件”不仅影响着翻译的本体论范畴与表征方式,而且也影响了学界对于翻译的书写和接受的历史性理解。以“事件”为切入点审视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和场域性,既可以凸显翻译的多重生产因素,又可以揭示翻译在历时性发展中与事件之间的共时性流变。这种态度与建构主义关于知识生成问题的逻辑是一脉相承。建构主义认为,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即知识生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会不可避免地发挥其能动性,并在历时性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其认识。

拉康说,主体不只是认识的主体,也是“欲望的主体”(刘玉贤,2011:26)。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译者。几乎在任何的翻译行为中,译者都会在自己幻想的基础上,并在欲望的推动下,希望借由翻译活动构建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秩序。因此,对于翻译事件的解释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更不能离开译者作为“人”的个体需要、目的与愿望等。正如戴维森所说,世界万物一旦离开了作为“思想的造物”的“人”,便无所谓真与假了(罗蒂,1992:10)。当我们对翻译现象进行审视与评价时,必须严肃地考虑翻译的事件性,以及主体在这一事件中的立场与信念。因此,与其应该问“译本是否正确无误地传达了原作的意义”、“译本是否具备了原作的文本语言特征”,或“译者传递给宿语接受者的效果是否同原作相同”等问题,毋宁应该问“什么人在什么事件的背景下,出于什么目的或需要完成了什么样的翻译行为”,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某一翻译作品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同或

抵制”。如此种种反映的都是翻译的事件观和系统观。

罗蒂曾说,任何东西除了存在于一个极其庞大、永远扩张的关系网络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方面有待我们认识(南帆等,2009:49-56)。有鉴于此,罗蒂认为应当用“关系主义”代替“本质主义”,一来可以在关系网络中考察文学、翻译或其它艺术形式的“外围”,二来也可以让艺术形式的性质、特征和功能等在这种关系网络中重新定位。H·阿拉姆·维塞尔也说,人类的一切表达行为都处在物质实践的网络之中(Veeser,1988:9)。维塞尔关注的核心是文学,但既然是“一切表达行为”,其中自然包含了“翻译”。翻译同物质实践活动之间无疑存在关联,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翻译文本与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处于不断的相互流通之中。从近代中国的翻译历史看,梁启超、鲁迅等翻译家们便常常把“流通”中的“社会能量”作用于翻译过程。在多元系统理论和操纵学派那里,这样的作用过程被称作“协调”(negotiation)与“挪用”;其次,在翻译的功能问题上,无论是罗蒂代表的实用主义者,还是维塞尔等新历史主义者,二者都特别强调翻译等艺术形式对于系统的反哺作用。这种作用通常表现在翻译的政治功能上。一方面,翻译可能是系统地揭露、批判和反抗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系统的维护和强化者。所以,无论是建构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抑或是新历史主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翻译行为事件化和历史化。同时,将社会关系化和网络化,并将处于这一关系和网络中的翻译看作某种积极的社会实践行为,或特殊的写作方式,把翻译的适应、建设与强化作用同翻译的抑制与颠覆作用统一在翻译的“事件化”的背景中。当然,翻译的事件性并不像福柯与德里达的“解构”那样,从根本上否认源语文本的实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只能固守着文本的语言框架。正如文学是历史语境的建构一样,翻译行为中也没办法将历史语境、语言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加以抽离。因而,翻译从本质上讲并不具有超越时空条件的纯粹客观性。非但如此,翻译就是

事件化的结果,是“特定时空和过程的产物”(高小康,2009:6-11)。

结语

翻译有其本质,至少从苏格拉底的“是什么”命题看即是如此。翻译的本质在于翻译的语言性,后者的在场或缺场影响着翻译实践能否在属性和特征上区别于其它语言实践。但翻译的本质论不同于翻译的本质主义,后者是从哲学意义上对翻译现象及其相关范畴进行的一种本质主义描述与阐释,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皆有缺陷的翻译研究思路。翻译的本质主义又名本质主义翻译观,它将语言和文本当作自足自主的实体,认为语法具有生成性,既排斥意义的建构性,又排斥主体及接受者因素的参与性。而建构主义认为,翻译是一种建构性的话语行为。在此行为中,虽然语言具有规约性,但意义并非先在地附着于语言符号之上,因而译者不可能单凭所谓“正确、科学的”方法,便能把握翻译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翻译具有显著的“事件化”特征,它必须关注翻译的主体性,以及翻译主体所在的当下生活和现实处境。“事件”作为翻译的外部条件,不仅影响着翻译的表征方式,而且影响着翻译的生产、书写和接受,凸显了翻译行为的多重生产因素、翻译的历时性特点,以及翻译与事件之间的共时性流变等,因而表现出显著的哲学意义上的建构主义特征。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晚清翻译政策研究(1840-1911)”(17YJA740043)和广东省哲社“十三五”规划项目“晚清西学翻译中的政府因素研究”(GD16XWW1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奥努弗(尼古拉斯·G).建构主义的哲学溯源探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9):58-66.
- [2]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M].蔡毅等(编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 [3] 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 [4]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5] 丹·斯珀波、迪埃瓦·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6] 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大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7] 冯棉.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哲学思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5):9-14.
- [8] 高小康.建构论与本质论:为承认而斗争?[J].文艺争鸣,2009(5):6-11.
- [9] 贺爱军、乔璐璐.从“译”到“翻译”——翻译本体话语的演变与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2013(1):41-49.
- [1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1] 孔慧怡.重写翻译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
- [12] 黎昌抱.汉语析字及其英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6(3):39-42.
- [13] 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14] 南帆、练暑生、王伟.多维的关系[J].文艺争鸣,2009(9):49-56.
- [15]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尧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6] 释慧皎.高僧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 [17] 释惟祐.出三藏记集[M].苏晋仁、萧辣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 [18] 谈际尊.伦理普遍性:试论黑格尔对教育本质的厘定[J].伦理学研究,2012(1):48-53.
- [19] 汤姆·洛克莫尔.康德与认知建构主义[J].哲学分析,2014(4):51-60.
- [20] 陶东风.博言天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 [21] 王向远.“翻”、“译”的思想——中国古代“翻译”概念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6(2):138-156.
- [22] 王至元、陈晓希.从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介绍之一[J].国内哲学动态,1983(2):14-18.
- [23] 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M].李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 [24] 许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第1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 [25] 易小明.本质的生成和生成的本质[J].社会科学战线,2005(4):282-285.
- [26] 员俊雅.建构主义: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2):4-9.
- [27] Eagleton, T.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28] Eggen, P. & Kauehak, D. *Educational Psychology*[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7.
- [29] Veeger, H. Aram. *The New Historicism*[M].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30] Vygotsky, L.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in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作者简介]宋以丰,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晚清翻译史、翻译理论。

[作者电子邮箱]yuguis008@163.com